

为什么要重读白求恩

□杨明伟

加拿大华裔作家李彦出版了新著《何处不青山：白求恩的故事》，她以在加拿大生活近四十年的经历，为中国读者深度探究到我们并不完全了解的立体化的白求恩。

白求恩是一个品德高尚、思想纯粹的人。作者曾深入寻访白求恩家族史料及其后人，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白求恩家族的基因襟怀坦荡。”白求恩从医以来，他就致力于为广大穷人服务。在来中国之前，他就加入了共产党组织，表达过自己坚定的信仰；1936年，他还主动要求奔赴西班牙战场，为那里的反法西斯战士服务，并为自己写下了这样一句墓志铭：“生是资产阶级，死为共产主义者。”据作者研究，白求恩也有过特立独行、脾气暴躁、固执己见的一面，因此与人相处总难免要闹别扭。

《何处不青山》中记录的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白求恩，他的精神境界、理想追求、爱恋遗憾、复杂情感。1938年初，他有了一个新的人生：为了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白求恩率领医疗队，“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从此白求恩的人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白求恩找到了自己的“战场”，成就了他的事业，“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以毫无私己的动机全心全意地为反抗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中国人民服务；二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及其领导的队伍成就了白求恩，使他的人生境界和精神世界得到极大升华。

对于白求恩的思想和精神，在《何处不青山》一书中有着清晰的记载。刚到延安，白求恩就申请尽快到八路军抗战前线去工作。由于各种条件还不太成熟，组织上也需要白求恩先在延安停留一段时间，以便他更多地了解情况和发挥作用。对不能马上到前线去，白求恩非常苦恼，甚至“很愤怒”，也发了脾气。而毛泽东对白求恩的到来，却是非常欢喜的，他兴奋地对人讲：“你有没有觉得，白求恩大夫长得很像列宁？”他们彻夜长谈，甚至忘记了时间。

从延安到达晋察冀前线后，白求恩觉得自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真正的一员，他在给加共战友的信中带着深厚的情感表达过，“我无比幸运，因为能够与那些真正把共产主义作为生活准则，而不仅仅是奢谈和空想的人们为伍，并肩战斗”“我逐渐爱上了他们，而且我知道，他们也同样爱着我”。在他生命最后一刻写给聂荣臻的遗书中，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让我把千百倍的热忱送给你和千百万亲爱的同志们。”从《何处不青山》的描述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白求恩与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将士们之间的这种情感与灵魂的深度融合。

李彦的这本书里还生动地记录了白求恩在中国一系列鲜为人知的故事，记录了白求恩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聂荣臻等中共领导人的友好交往，以及白求恩与八路军的一些普通战士之间的深厚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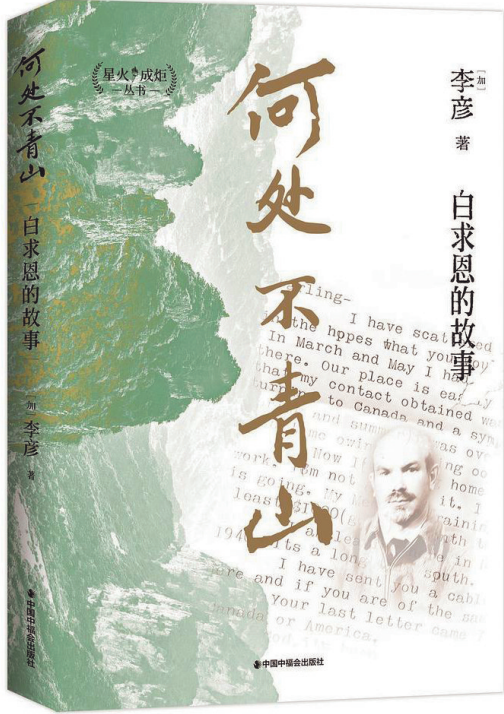
谈罢李彦的《何处不青山》，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她曾与同事合编过的另一本有关白求恩的英文著作《重读白求恩》。与她认识多年，我一直在想，她为何热衷于持续不断地挖掘、研究白求恩？我个人体会，这里面最关键的还是白求恩现象和白求恩精神的独特魅力。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一种特殊而耀眼的现象：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友人，一旦深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中，他们总会被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那些人、那些事所感染、所震撼。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白求恩和白求恩精神，已经成为一种极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正如作者所说，提起白求恩，人们自然就会想到他所代表的“国际主义精神和人道主义精神”，“白求恩是一个国际主义战士。他不仅仅属于出生成长的加拿大，也不仅仅属于他所奉献牺牲的中华大地。与众多国际友人一样，他们之所以可敬可爱，皆因他们是真诚的信仰者”。

白求恩是一个加拿大人，他也是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队伍中的一员。正如叶剑英在抗日战争期间介绍我们这支队伍时所说：“我军在抗战中光荣牺牲的烈士，不仅有中国人，还有国际的朋友。下面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中的国际友人牺牲于战争中者：医生诺尔曼·白求恩，加拿大人；医生柯棣华，印度人；太平洋学会成员希伯，德国人……”说到这里，我联想到历年来盟国朋友，对我国许多援助，我全体军民是感激不尽的。”白求恩早已把自己当作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员；白求恩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中产生的标志性精神。

谈罢《何处不青山》这本书，我感触最深的，是无论时空如何变幻都始终不会过时的五个字——“学习白求恩”，以及



《何处不青山：白求恩的故事》，李彦著，中国中福会出版社，2026年3月

书中特别记录的毛泽东主席在《纪念白求恩》中所概括的“五个一”：“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学习白求恩”的口号，就是毛泽东主席首先提出来的。据不完全统计，毛泽东至少有五次提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队伍要“学习白求恩”，反复提倡要向这样一位“大有利于人民的人”学习。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

1939年10月下旬，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在晋察冀边区为在战斗中受伤的八路军战士施行急救手术时不幸被感染，于11月12日牺牲。消息传到延安，毛泽东万分悲痛。1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其中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研究如何悼念白求恩和学习白求恩精神。会议决定：延安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并由中共中央、八路军和追悼大会三者的名义向其家属发慰问电。

1939年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白求恩大会。毛泽东为大会题写的挽词是：“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追悼大会提出：“为了抗战胜利，我们要培养出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白求恩来。”

在追悼大会后，为进一步追忆和学习白求恩，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领导决定，由八路军军政杂志编辑出版《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12月21日，毛泽东亲自为纪念册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学习白求恩》。毛泽东明确提出：“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精神。”他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私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这篇文章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才改题目为《纪念白求恩》。

1940年11月12日，毛泽东前往离延安城十五里的中国医科大学，其间专门参加了该校师生纪念白求恩大夫去世一周年活动。他在讲话中特别勉励大家，要向白求恩大夫学习，为革命多做工作，多做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号召医护人员要向白求恩学习，亲笔题词：“学习白求恩，学习雷锋，为人民服务。”

今天再读白求恩，深感白求恩精神具有极强的历史穿透力和现实推动力。从毛泽东号召全党学习白求恩时总结并提倡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对工作的极端的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以及“这就是我们的国际主义，这就是我们用以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和狭隘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等丰富内涵来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进一步学习和践行白求恩精神，对于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仍然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原局长、理论中国网原总编辑）

聂华苓(Hualing Nieh Engle),1925年生于湖北,旅美华文作家。代表作有《翡翠猫》《失去的金铃子》《桑青与桃红》《梦谷集》等。1967年,聂华苓与丈夫共同创办“国际写作计划”项目。1988年,她开始专门从事写作。2024年10月21日,聂华苓于美国逝世,享年99岁。

阁楼内外 明暗之间

□刘川鄂

阁楼在女性写作里从来不是一处普通的房子。它窄、矮、偏,处在宅第的顶端,既在屋里,又在生活之外。伍尔夫说,女人写作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吉尔伯特与古芭却把这句话翻了过来,认为父权社会把女人分成“天使”和“疯女人”两类,不肯当“天使”的,就被关进阁楼,成为被藏起来、被说成疯子的人。《阁楼上的疯女人》推动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女性形象”与“女性空间”分析,“阁楼”“深宅”“内室”一类封闭空间与女性命运的关系,成了常见的分析切口。

聂华苓的长篇《桑青与桃红》为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丰沛饱满的东方样本。全书按四层地理空间展开:瞿塘峡的流亡木船、北平沈家老宅的内院、台北的阁楼、美国的地下室。四者之中,阁楼停留时间最长,也是唯一被单独命名的一处。小说第三卷几乎全部发生在台北一间四叠半榻榻米的阁楼上。一部以流亡为主题的小说,最要紧的一卷偏偏写一个最不流动的地方,这个安排意味深长。

阁楼与内院,身体与时间

小说对阁楼的交代,几乎像一份清单:“四个榻榻米大的阁楼。人字屋顶左右两撇低低罩在头上。我们不能站起来,只能在榻榻米上爬。八岁的桑姪可以站起来,但她不肯,她要学大人。”这段话的力量在于它不抒情,只报尺寸。成年人放弃直立,用爬代替走,用弯腰代替站立。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八岁的孩子:她明明站得起来,却“不肯”站,要学大人爬。规矩就这样完成了代际传递。一间屋子把人的身体感觉重新组织了一遍。长期困在低矮空间里的孩子,失去了按习惯直立行走的机会。禁闭伤的不只是行动,也是身心。

阁楼的边界也写得清清楚楚。一扇小窗对着街,窗子左边看见三号房的屋顶和围墙,右边看见五号房的屋顶和围墙,乌鸦从一个个屋顶飞过,“窗子正面对着火葬场的黑烟囱。我们不敢站在窗口。怕给人看见了”。这扇窗是阁楼通向外面的唯一通道,它朝向的却是火葬场的烟囱,即便站在窗前,也必须躲藏。风景和死亡摆在一处,望一眼都成了冒险。

小说中,时间的过法同样窘迫。阁楼没有书桌,除了床几乎没有余地,白天只能抄佛经、翻旧报刊、听巷口的哨子。抄经是重复而无创造的动作,翻旧报刊是在没有新消息的世界里反复咀嚼旧消息,听哨子是把外面的响声当作唯一的消息来源。这些动作有一个共同点:都指向过去,不指向将来。人被关注的还有时间——“生活”不再是常态,只是维持生命的最低运转。

聂华苓写阁楼,几乎不用“压迫”“窒息”这类词。她让尺度、姿态、视野、动作自己说话。写苦难最容易失控的地方是形容词。她把形容词省下来,交给数字和动作,读者反而被压得透不过气。

阁楼与北平沈宅的内院是同一套逻辑。沈宅内外院分得清楚,外院是男人来往做事的地方,内院用实墙和狭小房间把女人的活动范围圈起来。内院与阁楼,一南一北,一宽一窄,规则却一样:女人该待在她们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半径由别人定。从深宅大院到一间阁楼,空间越缩小,恰好对上桑青境遇的每况愈下。这双“看不见的眼睛”,正是福柯所说的全景敞视。让处身其中的人“能被观看,但他不能观看”,即便没有监视者,也自己约束自己。

在书中,阁楼成了一个双重的异托邦。它在宅第之内,却在生活之外,它是女人的居所,也是她的牢房。阁楼虽小,至少还有一处容身之地,安分守己,不要惹麻烦是不得已的选择。她已经把外面强加的规矩内化成自己的处世之道,不再需要外部强制,被关的人开始替它看守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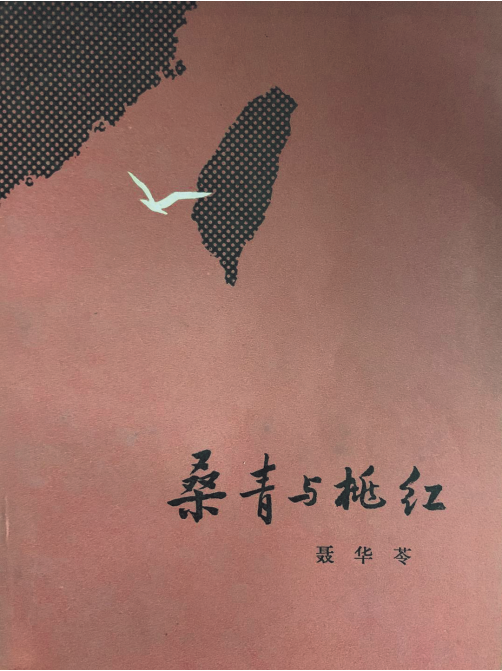
《桑青与桃红》最引人注目的构造还在于把一个人分成两个名字、两种人格、两套语言。小说中,桑青是被规训、被内化的“天使”,桃红是拒绝顺从、因而被判定为“疯”的另一半。

小说还有一处早于第三卷的伏笔,可以看作“疯女人”的初次登场。桑青曾被关进堆放破烂的阁楼:“她把我关在堆破烂的阁楼里。”“窄小,昏暗,楼梯成了个黑影子,妈妈一动不动站在门口。我跪在地板上哭。”这一次执行禁闭的是母亲,被关的是女儿。女人既是规则的承受者,也成了规则的执行者——这比控诉某个外部权威要更深一层。桑青属于规训的内化。她以隐忍、妥协为基调,对婚姻、囚禁、移民局调查都不反抗,把空间的枷锁当作既定事实。她的文字形态本身就是受压的证据:她的日记多是短语,基本不用逗号,那种破碎、短促的句法,正合小说充满幻觉的压抑气质。

桃红是从这里分裂出去的反叛者。长期幽闭之后,桑青心里长出了“桃红”。写给移民局的信坦率而无所顾忌,不把旧道德当一回事,也不隐瞒自己的冲动和逃离的动机。桃红自己行动,自己释放情绪,用高度反叛的方式解除



聂华苓



阁楼与地下室造成的压抑。逼仄的境遇反而成了精神逃逸的助产士:正因为没有出路,才必须造出另一个自己来承担出路。

同一间阁楼,于桑青是沉默的理由,于桃红是反叛的起点。肉体被关住,精神却可以分裂而逃逸。这是《桑青与桃红》的基本美学矛盾:即便在最严的规训环境里,人仍能造出一块不顺从的精神区域。但桑青与桃红不是善恶、顺从与反叛的二分。桑青的隐忍是一种生存智慧,桃红的反叛也未必健全。二者合起来,才说明一个离散女性如何在极端压迫下完整地活下去:既要顺从,才能维持基本生活,又不能完全放弃精神的自主。

人格分裂是内容上的空间化,文体分裂则是形式上的空间化。小说双线交替。“桑青日记”封闭、内向,对应阁楼的禁闭。“桃红书信”开放、外向,对应公路的流动。两种文体轮番出现,正好复现人对囚禁与逃逸的反复心理。把抽象的精神分裂放进具体的空间关系里,这一手法在华语文学中是有开创性的。

“一间屋子的尺度”

从北平内院到台北阁楼,再到美国地下室,女人被安置的位置一路向下:地面、半空、地下。这条垂直线索是小说最直观的空间叙事,也把封建礼教、移民制度等几种权力串起来,形态不同,效果一致,即一步一步压缩女人的活动范围。

更值得留意的是阁楼的“后效”。生活在海外,桑青的感受仍时常回到瞿塘峡的木船和日式阁楼。阁楼对桑青正是这样一处被内化的空间:它不再只是台北的一间屋子,而成为人格中稳定的一部分,后来的地理现实取代不了,也抹不掉。小说结局把这一点推到极致:辗转大半个世纪,她连“桑青”这个身份也主动抛弃,肉身停在美国的破阁楼里,精神却永远在漂泊。阁楼由建筑变为隐喻:它是离散者身份消解的容器。

要说清聂华苓走到了哪一步,还得回到吉尔伯特与古芭的那本书。学界通常把《阁楼上的疯女人》视为女性主义批评“女性作家研究”阶段的扛鼎之作。它第一次系统追问“女人如何写作”。包括19世纪的女作家为什么普遍使用囚禁与逃跑的意象,为什么习惯用“疯狂的重影”作为驯顺自我的反叛替身。

19世纪英美小说中的“天使/疯女人”是在特定的宗教、婚姻与财产制度中生成的。在《简·爱》一类文本里,阁楼上的疯女人始终是另一个人,是被隐藏、被解释、最后被牺牲的他者;而在《桑青与桃红》中,“疯女人”并不外在于主人公,她就是主人公的另一半,最终还取代了“天使”的位置。这一笔把阁楼从外在的禁闭场所变成内在的人格结构——囚禁的最终成果,是让被关的人自己也承认那个顺从的名字再也用不上了。桑青的阁楼与罗切斯特宅第顶楼那间屋子遥遥相对——它们都属于世界文学中被囚禁的女人,也都提醒读者:一间屋子的尺度,往往就是一个时代对女性全部规定的尺度。

与西方文学里的阁楼相比,聂华苓有明显不同。聂华苓让一间不足五平方米的屋子,同时容下性别、制度与离散三件大事,并让它们在同一处空间里彼此纠缠。阁楼意象的频繁而准确的运用,足以显示聂华苓的女性审视和叙事手法的超强功力。文学史应该特别标识:在20世纪华人作家中,较早且集中地运用阁楼意象的,首推聂华苓。她的文本既是这一经典文学意象的回应,更有中国语境下的超越,值得我们重视。

（作者系湖北大学教授）



加拿大华裔画家 Matthew Wong 作品

華苓

唐建成書